

# 汉学发展前景无限<sup>①</sup>

□ 任 继 愈

20 世纪的后 50 年，中国文化和世界各国的文化接触越来越频繁。世界各国比过去更需要了解中国，中国也比过去任何时代更需要了解世界。中外文化交流随着经济利益的驱动日益开展。我们的国际友人日益增多。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足以说明这种事实——需要（包括个人的、群体的、民族的、国家的）是一切学术最有力的推动者，汉学研究的兴旺势头正方兴未艾。只要看看东方、西方以及南方各国的各种学校开设中文课程和学习汉语人数的增长这一现象，即可以预见汉学研究正处在大潮高涨的前夕。21 世纪的前景将比 20 世纪的后半期更繁荣。汉学将成为世界的显学。

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由于地缘关系、历史原因，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国

此文系 2001 年 9 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家汉办和大众出版社联合举办的“世界著名大学汉学系主任（汉学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家。民族的人口有多有少，国家管辖的范围有大有小，这种差别是历史形成的，其结果是文化的多元化和政治的多元化。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这种现象总归是事实。这个多元文化的世界在交流中，只要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大家就会从中受益。

汉学研究在今天看来，是我们学术界的事，首先是对汉学研究有兴趣的专家学者的事。但是我们可以预言，汉学研究的广泛效应、深远影响，远远超出汉学研究的学术范围。它将增进世界各国系统地理解中国的昨天和今天，把中国文化有价值的部分融入世界文化思想宝库，成为世界文化财富的一部分。如果从长远着眼，从大处着眼，汉学研究对世界和平的进展也将会发生长远的积极作用。

我是研究历史和哲学的。文化现象的研究是认识社会的一个切入点。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文化的特色也是民族的特色。文化有两个层面，一是生活文化，二是观念文化。生活文化包括饮食、服饰、住房以及音乐、舞蹈。这是每一个民族都有的，每一个旅游者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会很容易发现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别。至于观念文化，它处在思想观念的深层，这是一个民族抽象思维能力发展到一定高度以后的精神产品，观念文化的出现至少要有完备的文字 有一定发达的科学 有系列文学、哲学的著作。因此，观念文化不是每一个民族都具备的，它是高度发达的民族文化的产物。大体说来，观念文化成形于文化发达的地区。如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文化 都对人类做出过贡献。现在我们讨论的是汉学，这里只说中国。

据历史文献记载及考古学的证明，中国古代文化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有 5000 年以上 它几千年来以黄河、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为基地 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 它持续发展直到今天 历史没有中断过。

认识到中国文化的特点，就找到了汉学研究的切入点。今天

的中国是从古代中国演变来的。研究汉学必须从生活文化入手，这是一般的途径。但中国文化不仅仅是生活文化，还有更深层次的理念文化。衣食住行，这些方面容易看到，改变也容易。比如近半个世纪，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住房、交通变化很快，几年不到中国来，再来就会感到诧异。但是观念文化方面却是另一回事。比如中国文化的价值观、伦理观、家庭观、宗教观诸多方面以及关于自由、平等、民主的理解，中国人与西方社会的差异十分明显。做到真正了解、深入交流，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因此，我们汉学研究首先是语文桥梁建筑师，架通语言交流的桥梁。国际汉学经过我们大家几十年、几代人的努力，成绩显著。而随着汉学研究的深入，我们不能不深入到观念文化领域，接触到中国文化的核心，必然涉及中国的哲学、文学、宗教许多领域。这是 21 世纪对中国文化深入了解的必由之路。

反过来考虑，中国学者了解西方的过程，对我们汉学研究者不无可供参照之处。“五四”时期中国学术界关心“西学”。当时人们关于“西学”的意义相当含糊，既包括欧洲的文学、哲学、宗教，也有社会学、政治学以及自然科学。中国学者将但丁、荷马、莎士比亚以及托尔斯泰、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大师的著作传到中国，中国对“西学”的理解逐渐具体、深刻。“汉学”研究范围有多大，学者们的理解并不一致，正如当年中国学者对“西学”的理解多有差别一样。随着研究的开展，对中国观念文化的认识越来越具体，“汉学”研究范围必将会自然地得到解决。因为中国文化历史长、方面广，无论从文学、哲学、宗教、历史学诸多领域均可供研究深入开展。作更长期的推测也许不易准确，21世纪最近 50 年，大家必将看到它的繁荣景象。全世界汉学研究者携起手来，把这门学问推向更高的阶段。汉学研究给我们提供了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舞台。丰硕的成果必将出现。

汉学研究，前景无限！

# 作为专门学科的国际 汉学研究

□ 李 学 勤

2001年9月6日至9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在其60周年校庆之际举办了“世界著名大学汉学系主任（汉学家）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一次国际汉学家的盛会，会议的主旨，是要“推动海外汉学界与中国学术界的互动，加强汉学研究和汉语教学的联系，并从总体上推动中国文化的研究”。我提交会议的论文题目，原拟作《作为专门学科的汉学史研究》，后来仔细考虑，就改成《作为专门学科的国际汉学研究》了。

对于“汉学”“汉学史”“国际汉学研究”这样几个词，我想在这里说明一下。“汉学”，英语是 *Sinology*，意思是关于中国历史、文化、语言等的研究。把 *Sinology* 译为“汉学”早已约定俗成，现在在中国也比较习惯了。但中国讲的“汉学”主要是指外国对中国的研究，有时严格一点称作“国际汉学”或“海外汉学”。因此，“汉学史”便是国际汉学形成和发展的

历史是把重点放在汉学的过去。至于“国际汉学研究”意思更为广泛，不仅研究汉学的过去，也包括汉学的现状甚至未来。“国际汉学研究”，是对汉学本身所做的考察和研究。

众所周知，国际上的汉学从16世纪后期（相当于中国明代中叶）开始产生算起，已经有了400多年的历史。今天世界各国的重要大学，都有汉学的系科或研究所，国际汉学早已成为世人公认的学科了。但是，国际汉学研究，即对汉学历史、现状的研究，则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在中国兴起。

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国恢复了与国际汉学界的交流，中国学术界迫切要求了解国际汉学。工作首先是从介绍汉学现状、编写汉学家人名录起始的，然后开展了汉学论著的翻译出版。这可说是第一阶段。到了90年代，在清华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单位，先后建立了经常性的国际汉学研究机构。同时，《国际汉学》、《清华汉学研究》、《世界汉学》等刊物也陆续出版。引人注目的是，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海南召开了“中国国际汉学研讨会”，随后又有一系列国际性的汉学会议在国内举行。这可说是第二阶段。及至20世纪结束，中国的国际汉学研究已经真正成为一个新兴的专门学科了。

国际汉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的迅速成长，是由于它适应了中国学术界以及社会公众的需要。人们希望知道，外国汉学家是怎样看待和研究中国的。我认为，国际汉学研究这一学科，至少应当回答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的问题，是汉学如何起源，迄今走过了怎样的发展道路。

这个问题属于上面说过的汉学史的领域。过去这方面的研究作品比较多，有关学者的目光大多被引向古代，热衷于探索古代欧洲人对中国有多少知识，什么时候有西方人来到中国，对中国做出了哪些记述等等。这种问题现在仍受到关注，比如这几年对《光明之城》(*The City of Light*)的热烈讨论就是例子。不过大

家更希望知道的，乃是近现代汉学的发展。

近几年有几本写得很好的分国别的汉学史专著出版，但仍然没有一部汉学的通史。中国人写的汉学通史，还是只有 1949 年莫东寅根据日本石田幹之助《欧美的中国研究》等编著的《汉学发达史》。重写汉学通史的工作，看来已是刻不容缓。

第二个问题 是汉学对中国历史、文化、艺术、语言等等方面，已经做出了哪些研究。

汉学的第一种著作，是 1583 年在罗马印行的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 (Juan Gonzales de Mendoza) 的《中华大帝国史》。同一年，利玛竇 (Matteo Ricci) 来到中国，与不曾亲自来华的 门多萨不同，他不仅直接接触了中国文化，而且学会了汉语。其著作与札记表明，利玛竇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从那个时候起，汉学有了十分丰富的文献积累。

到了近代，汉学越来越专业化。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许多是我们需要借鉴的成果。现在世界上每年每月均有大量汉学论作出现，而中国学者的研究如果不征引外国同行的成说，应当视为缺憾。了解国际汉学的工作动态，是中国学术界的需要。

第三个问题，是汉学家及其著作是在怎样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中产生的。

对于一位学者，以至一个学派的研究，总是应将之放在其社会、文化的具体环境里面去考察。我们看到，最近在国内报刊上有不少外国汉学家及其作品的评介 相当详尽 是很好的 然而对其背景的分析，却每每有不足之处。

汉学家常有自己的师学系统，同时其学说观点又必然受当时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哲学、社会学与史学理论的变迁，不时会在汉学家的作品中得到表现。若不注意这一点，就很难体会一些汉学家特有的思想与风格。这个角度的研究，我们做得还非常不

够。

第四个问题，国际汉学对中国学术的演变发展，起过什么样的影响。

汉学是伴随着中西文化的相遇和碰撞诞生的，与之同时，在中国也产生了西学。晚清以后，西学大为兴盛，其间西方的汉学也进入中国，影响到中国的学术界。汉学的不少学说，为中国学者传播接受，引起学术界的热烈争论。

与上述问题相对的，是第五个问题，汉学对西方学术的演变发展，又有着怎样的作用。

日前在报纸上看到翻译《纽约时报》今年指 2001 年——编者注 8 月 29 日的一篇文章 题目是《耶鲁盛吹中国风》。文章中 说 耶鲁大学重视与中国学者交流“，耶鲁大学的一些官员说 因 这些交流活动而改变的不仅是中国。他们说，从长远来看，中国 也会对耶鲁产生更多影响。……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文化当然会 使耶鲁人反思自己的价值观”。

这段话说了对。事实上历史的情况也是一样，西方人来到中国 建立了汉学 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 汉学的研究也影响 了西方学术本身。日本京都大学的岛恭彦教授，在 1941 年出 了一本书 叫《东洋社会与西欧思想》 论述的内容就是研究包括 中国在内的东方怎样改变了西方的思想史。可惜像这样的论著， 迄今还不多见。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国际汉学的现状，以及在新世纪中 汉学进展的趋势。

二次大战后不久，日本学者即曾对国际汉学界的状况做过普 查 包括哪些大学或科研机构有汉学专业 藏有多少书刊 拥有哪 些学者，正在从事什么工作，教授多少课程，形成专门的调查报 告。前些年，我国台湾的学者也做过类似的调查。

我们很有必要系统地做这方面的工作。最好组织出版《国际

汉学年鉴》及时反映汉学界的情况，介绍汉学的新成果。与此同时，可以在互联网上建立网页，供大家随时检索。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学术界与国际汉学界的交流沟通尚有待于加深扩大。国际汉学研究作为一种专门学科的发展，将有益于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我们希望得到国内外更多的支持，使这个学科发扬光大。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

# 汉学家的文化血统

□ 陈 跃 红

记得‘文革’刚收场不久，针对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存在的与西方学术界隔绝的情况，钱钟书先生就指出：“我们还得承认一个缺点，我们对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学的重要论著几乎一无所知；这种无知是不可原谅的，而在最近的过去几年里它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亏得它并非不可克服的。”<sup>①</sup>

从那个时候至今，二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当年论及此事的钱先生已归道山，然而他所寄期望克服的缺点，我们改变得怎么样呢？如果看看坊间出版的各种海外的文学研究著述和不断创刊的多种与汉学有关的刊物及丛书，毫无疑问，我们是有了极大的进步。但是，这并非意味着事情已经基本解决，存在的问题依旧颇多。譬如不能够认为有了学术的交流 and 成果的引进，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如果

钱钟书：《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1978 年在意大利一次学术会议上的讲稿。

在观念和学科意识方面依旧是因循旧制，则可能这交流的结果只是一堆的误解和误读，或者干脆就是一场学术交流的三岔口，隔膜得很，到底也没有弄清谁是谁。

私意认为，如果希望对海外的中国文学研究有比较理性的了解，乃至要对整个西方汉学学科有比较客观的认识，除需要加强交往和介绍之外，一个尤其重要的问题是，应该在各自学科的观念上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区别，千万别被某些表面的相似给弄昏了头。

## 一、这“汉学”不是那“汉学”

“汉学”作为一个中国传统学术的概念，最初是指汉代以来一种侧重从经史、名物、音韵、训诂的考据立场去研究中国经学的学问，亦即所谓汉宋之学。它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国学学科。然而，汉学这一中国古代的学术概念，在现代中国已经被当做历史而束之高阁，成了学术史的范畴，而不是当下某一学科或研究领域的正式命名。

事实上自 20 世纪以来，“汉学”和“汉学家”这样的概念早已经被我们转赠给了洋人。面对着一门以中国文化为研究对象，英文称之为 **Sinology** 的洋学问，翻译的时候由于要找对应的术语，又因其在研究的对象上与中国古代的汉学有相似之处，于是就名之为汉学了。而从事这类研究的洋学人，我们就称他们为汉学家 (**Sinologist**)。

两个汉学，一个是本名，一个是译名；一个是古义，一个是今用。尽管称谓上相同，但二者不是一回事。这“汉学”不是那“汉学”，这“汉学家”也不是那“汉学家”。一是本土传统学问，一是外国学人的学科，二者相去远矣！

或许有人认为它们的研究对象是相同的，但任何一本严谨的

学术史都会告诉我们，以研究对象去划分和认同学科，很可能是最靠不住的方法。更何况我们上面所说的“汉学”这种东西，一是中国古代的概念，一是洋学科洋名的翻译借代。其间的时空和文化差异隔着差不多 2000 年和大半个地球。用现代阐释学和比较文化的观念去看，因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不同，其间的关系性质也截然不同。中国人研究中国文化是研究的“自我”，是在民族国家学术范围之内的运作；而外国人研究中国的文化，则是研究的“他者”，是在跨越民族、语言和文化的比较研究学科范围。它们在学术性质上有本质的不同。因此，在尚未弄清楚它们各自的缘起、性质、学术重心、学术倾向、理论方法特点 尤其是学科研究的目的以前，还是不要一时兴起，就随意认同为好。

我这样说当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感而发。实在是因为近年以来，国内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得含混、模糊的现象有增无减。在大多数本土学人的心目中，所谓汉学，包括西方、日本、韩国乃至苏俄的汉学，都不过是本土中国国学的延伸和推广，或者干脆就是海外分店的性质。在他们看来，汉学在学术源流上，只不过是历史上的汉宋之学的继承和发展而已。这样的见解，不仅证明我们对海外汉学，尤其是西方汉学的学科史缺乏了解，更重要的是在观念上的错位。我们一方面在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可是一旦有机会讨论汉学这样一门与中国历史传统有关的学科时，由于当下处于世界低位的文化情结，不知怎么就会激活了胸中的民族情绪，促使我们情不自禁地去把属于别人的汉学划到自己的旗下，从而给自己带来某种文化上的虚假自豪感。不妨说，这其实可以算得上是另外一种类型的精神自卑。

## 二、汉学三镜

在这样一篇随笔札记式的文章里，我当然不想试图去全面讨

论西方汉学的缘起、性质、理论方法和学术目的，并以此来证明它与国学的区别。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从一些学术现象中体会到二者的明显不同。

首先就西方汉学的发生和发展历史看，如果我们以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16 世纪末来华，并在若干年后写出《天主实义》作为汉学的起点，西方汉学完全可以号称有了 400 年的研究历史。但是汉学真正形成规模却是在 19 世纪中叶，也就是 1848 年鸦片战争前后的事情。仔细清理这一时期汉学的兴衰进退，就会发现，所谓汉学的发展轨迹，与西方对于中国的殖民掠夺历史大体上是相吻合的。

这实际上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即所谓汉学，只能是属于资本主义列强殖民文化的一部分，它与当时出现的所谓埃及学、印度学、阿拉伯学甚至人类学、社会学有大体相似的背景。关于这一点，爱德华·赛义德在其著名的《东方学》一书中有过十分精辟的论述。根据当代学界对于所谓东方学（或称东方主义）的研究和反思的成果，我们基本上可以这样确认：正如西方人对所谓东方学的命名和规定性一样，包括汉学在内的上述这些学科，也都是由西方人在其殖民开拓过程中所创立，并且是为着他们的殖民利益而发展起来的学术权力话语。也正如东方学是西方人的东方学一样，近代所谓汉学也基本上是西方人的汉学，与中国人自己研究自我文化的学术建构和目的不是一回事。在一定意义上，它们是在特定的时空语境内，一种强势文化对于一个处于弱势的“他者”文化的强行利用和精神占有。

在文化利用的意义上，这种占有包括为着掠夺、占领、传教、控制和奴役的需要，大力培养精通殖民地语言和各种人才，也包括尽可能地以殖民地文化作为中介，比较隐晦和巧妙地灌输西方殖民者的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等等。在这一方面，无论是早期的传教士，还是现代的东方学者们，都有过出色的成就。

笔者曾经在国外有机会读到过一些当年的传教士、探险者和汉学家写给他们本国政府的报告，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他们在如何从语言、文化和精神上去控制殖民地、半殖民国家和人民方面是如何的煞费苦心。

而在文化占有的意义上，西方利用经济和文化发展上的优势，自 19 世纪以来陆续建立了如埃及学、印度学等许多以非西方世界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从学术思想、基本概念、研究范式到方法论，也都建立起了相应的、符合西方文化要求的学术规范，并且试图使其成为全球的普遍原则，回过头来还要求非西方学界跟进。这当中汉学的情况也许比较复杂一点，但无论如何，本土的国学与海外汉学在基本的性质和学术目标上依旧有着根本的不同。

当然，汉学和其他学科的命运一样，一旦成为一门学术，就会情不自禁地为学术的某些规律所左右，从而生长出属于所谓纯学术的东西。而随着历史的进步，随着各种西方和非西方地区之间国家力量的消长、国际关系的演变和潮流的影响，在经历了岁月的淘洗之后，汉学过于分明的殖民文化的时代色彩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观念等，都会有所褪色和消减，而纯学术的东西则会逐渐突出起来。这有点像是被洗干净了的黑钱，再投资到其他正当的行业中去，有的甚至成为了慈善捐款，如果你不知道它的来龙去脉，也就无从知道它的干净与否了。

不过好在我们还没有糊涂到这种地步。首先，学科的历史发展进程和黑手党贩毒洗钱的行为毕竟不同，后者是地下的秘密运作，而前者却有公开的历史纪录，故而有迹可寻，有案可查。其次，汉学或者今日所称中国学的当代运作，也并非是按照我们本土所谓“汉学家”的意志去展开学术研究的。由于历史形成的学术惯性和现实原因，西方的汉学家们大多有着一套和本土中国学者不同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取向。无论是从解释学、接受理论或者

是形象学的观点去看，站在自我的文化立场去研究一个“非我”，一个“他者”是不可能和对于“自身”的研究等同起来的。更何况是有着特殊历史背景和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的学科。和其他东方学科大同小异，汉学家们也总是带着他们的各种透镜去关照和研究中国文化的，不妨把它们称之为汉学三镜：一曰考古学放大镜，二曰意识形态滤色镜，三曰文化哈哈镜。下面分别加以解说。

### （一）考古学放大镜

所谓考古学放大镜的使用者，是指这样一类汉学研究者，他们是把中国文化当做一个僵死的、呈现为过去时态的、没有现代意义的东方古代文化遗存来加以研究的。

他们重视的是中国的古代传统文化及其物化的产品，而不是至今仍旧存活和有生命力的一种文化传统。他们一手拿放大镜，一手拿手术刀，把一个古代中国文化当做是博物馆的藏品、藏经楼的典籍和文物发掘现场来加以研究。他们感兴趣的是 1911 年以前的那个古老的王国 是展览在大英博物馆、彼得堡博物馆、巴黎东方学院和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当中的那个中国。譬如，有的海外中国文学研究者就公开宣称对“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不感兴趣。在他们看来 就诗歌而言 中国的现代诗歌创作 只是对西方现代诗歌的拙劣翻译或拙劣模仿，没有什么价值。至于小说 至今在观念和技巧方面 始终还停留在模仿 19 世纪西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传统的落伍地步，不值一谈。即使是像弗里德里克·杰姆逊这样严肃的学者，也至多是把它们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民族寓言来加以解读，他所肯定的，其实也只是它们作为小说的外部的、非文学的意义 至于它们的艺术价值 却是完全可以忽略的问题。

多少研究一点汉学史的人大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在西方有一些汉学家，有的还是相当著名的学者，他们毕生未曾到过中国，也基本上不和中国学者甚至中国人打交道，可他们却因为

其在研究中国的古代思想、典章制度、文学等方面的成就而在西方学界闻名。有的汉学家就公开宣称，即使他终身不踏上中国的土地一步，也照样能研究好他的课题。如果说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外国学者由于特殊的原因而不能进入中国本土尚情有可原的话，在中国的大门开放以后，依旧有一些汉学家不愿意到中国来交流，这就值得深思了。他们的理由听起来很美也很有诗意，据说是担心破坏了他心目中早已建构起的关于古代中国及其文化的美好印象。其实，那只是他想象中的中国，一块充满奇异风情和乌托邦色彩的东方神秘土地，一个可以补充西方文化不足的“他者”和自我的“镜像”。

我不是说这类汉学家的研究没有价值，而是说他们的研究与中国的现实需求和活的文化传统没有什么大的关系。他们用考古学放大镜去发现的中国，只是他们的选择和再创造的结果，是作为他们文化的参照系来建构的。在内在的学术动力和外显的学术目标方面截然两样，这无疑正是海外汉学与本土国学在本质上的区别之一。

## （二）意识形态滤色镜

所谓滤色镜云云，主要是指有关发生在海外现代中国研究中的问题。该镜的使用者是属于和前一类汉学家明显不同的一群，他们的工作重心恰恰是现代中国进程的各个方面，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镜子就没有问题。

出现这类关注中国现代进程的汉学家群体，是与 20 世纪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版图变迁密切相关的。

不管考古式的汉学家们如何试图忽略现实中国的存在，中国这个在一个世纪之内从 4 亿人口发展到 12 亿人口在 20 世纪的不同时期中每每作出一些惊人之举的国家，让这个世界没法不面对她的巨大影响。其潜在的学术研究价值，让一些有研究癖好的外国学者梦绕魂牵，欲罢不能，以致光西方就有数以百计的研究

中国的大学院系和专门机构。二次大战以后汉学研究重心从欧洲向美国的转移，改革开放以来各国的中国研究热，也都与此密切相关。

麻烦在于，多年以来，西方研究者对中国情况所作出的判断和预测却屡屡失算，很少有成功的例子。觉得她已经快走上西方理想轨道的时候，她偏偏自行其是地调头而去；觉得她坚持不了的时候，她偏偏越表现出天长日久的生命力。以至于有人认为中国这个国家不可理喻 无法研究 也有人开玩笑说 谁要是把中国政治经济的某个重要谜团研究清楚了，可以给他超级诺贝尔奖。问题出在哪里呢？自然相当复杂，笔者当然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信口回答这个疑问。但是，从汉学或者说中国学研究的现状去看，至少有一个明显的精神情结在困扰着这些研究者，那就是许多西方人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滤色镜。

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心态，他们一方面忘记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并不仅仅是一些器物、典籍和遗迹的存在，而更重要的是流淌在中国人血管中的文化血液，离开这一点，就无从着手考虑中国的问题。如果只是看到那些表层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而忽略深层的文化问题，其研究的结论就难免不得要领。其次，这种意识形态的偏见，从一开始就使之对事情做了某种先人为主的价值判断，其后的研究往往就只是为着证实判断的合理性，这样“主题先行”的研究又焉能不走人误区。这种意识形态过滤的情形并不是个别现象。譬如国外在译介出版现当代中国文学作品方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就不是按照西方人一贯强调的艺术标准去选择，而是经常根据作者的意识形态立场去选择，或者根据作品本身的内容是否批判和揭露现存体制的所谓阴暗面来决定取舍。其结果自然是许多二流、三流甚至根本算不上文学艺术作品的东西，却被作为某一时期中国文学的代表作被介绍给西方读者，而真正具有较高艺术水准的作品却被束之高阁。在出售中

国文学译本的西方书店里，有两类作品比较显眼，一类是商业取向的书籍，如古代中国情色文学或者关于性问题的现代作品，另一类就是意识形态取向的书籍。无论是真是假，越是揭露内幕，越是把中国现状说得黑暗者，据说就越受青睐。当你拿这种疑问去请教那里的汉学家时，他们都会耸耸肩，做一番解释，将主要的责任推给书商和市场，看上去总是那么一脸的天真，好像他们自己从来都坚持学术中立，根本就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偏见似的。而事实上，只要去读一读某些汉学家的著述，看看他们交往的中国人，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同样，在对当代中国文学的研究方面，一些汉学家也不是从学术的角度去关注中国文学的主流和整体进展，而是热衷于对某些所谓持政治异议观点的作者的关注，对所谓地下的和另类的群体的宣扬，或者是对蓄意讨好西方的写作活动的扶持。其结果是一些在中国完全不为人所知，也实在谈不上有什么艺术成就的作者，打着中国著名艺术家的牌子在西方招摇撞骗。而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就是由一些我们所谓的汉学家介绍和邀请去的。

其实，我在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要按中国的标准去要求西方学者，要他们以与中国研究者一样的思路去研究问题，如果这样，那就完全失去了西方汉学的意义。我们所希望的，恰恰是他们从“他者”的文化立场对作为截然不同的另一类文化的选择、解读和诠释。问题只在于，这样的“他者”立场应该是真正文学和学术的角度，即使是误读，也该是那种具有西方文化和审美特征的读解和变形，是具有某种文化美学意味的误解和创造性的误读。它不仅能够成为西方学术思想和理论外求于他者文本的尝试，也可以而且应该给本土的中国人提供新的参照系。而惟一让人觉得无聊的，就是非学术化的、单一的意识形态偏见和价值判断。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汉学家都具有中立的学术立场，也并不在意其西方文化和理论视角所客观存在的隔膜，我们惟独不能接受